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几乎随处可以听到，许多培训班、提高班、学校招生广告，常常借此招揽生意。中学生留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近期，各种各样的夏令营相继登场，美其名曰：“让孩子夏令营进补，赢在起跑线上”，有的居然堂而皇之开出两周5000元的天价。

在“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驱使下，家长们纷纷使尽浑身解数，为孩子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而四处奔波……

其实，“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并不科学，苛刻地说是一种误导。孩子的成长，绝不像单纯展现瞬间爆发力的100米赛跑，起跑慢了一点就可能失败。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将近20年。20年的比赛，犹如千米长跑；如果加上工作以后的路程，更像一次考验信念守节的人生马拉松。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起跑线上的几秒钟，对于人生长跑或马拉松比赛而言，并没有那么神奇的作用。再说，那些号称能给孩子在起跑线上“加速”、“提速”的办法究竟有什么实效，还是一个问号呢！

人生犹如马拉松，比的不仅是一时的速度和智力，更重要的是比耐力、比毅力、比应变

力、比创造力。任何阶段的暂时领先都不能表明你将胜利。起步阶段的速度，或者说是分数，更不能说明最终获胜。

最近，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在所难免。如果确认“人生犹如马拉松”，能善始善终地跑到终点就是胜利，不如调整自己的心态，用平和的心情去面对眼前的成败，不必为眼前的胜利狂喜，也不必为暂时的失利而一蹶不振。

人生犹如马拉松，总体素质比分数更重要。翻开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史，700多人顶着状元桂冠，除了王维、文天祥、张孝祥等寥寥数人，其余皆湮没在历史尘埃中。首份《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表明，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国各省状元中，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有些人高考表现突出，人生职业发展却很平庸，混然众人也。这是当前应试教育内容、方式脱离实际的一个缩影。

“人生犹如马拉松”，与其迷信“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如在求知之道、理想实践之道上下功夫，不要让孩子输在终点。



■ 陆象贤

南翔是上海地下党的避风港

1950年8月30日，我于柏林召开的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见到了总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威廉·皮克。并在当天晚上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招待世界工联和各国工会代表团的酒会上，我与威廉·皮克有过一次关于地下党的对话。他问我是否知道恩斯特·台尔曼吗？我说，知道，在希特勒将恩斯特·台尔曼投入监狱时，上海的工人和学生曾经举行过抗议活动。他对我说：在德国许多同志遭到迫害时，除了逃到国外的以外，不是被投入监狱，便是被杀害。我对他说：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坚持地下党工作，积蓄力量，是因为有红军、根据地的支援。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员，在被敌人列入黑名单和受到搜捕的危险关头，党组织就将他们撤往根据地。当年主要有两处，一处向南到浙江根据地，也称四明山根据地，另一处向北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有的在根据地学习和工作，有的在情况变化后仍回上海工作。撤往根据地，沿途敌人的关卡多，须由交通员带领。遇有紧急情况，因交通员尚未返回上海，不能立即去根据地，还有一个避风港，就是邻近上

海的南翔。南翔交通很方便，即使步行，三小时多一点就可以到达。日本宪兵队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都以上海为重点，在郊区乡镇的力量则与之相差甚大。南翔人民有着革命的传统，群众基础好，曾为掩护上海地下党员在南翔避难发展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1944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批示》，要求将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准备在时机成熟时里应外合，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华中局城工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明确上海地下党的任务转变到开展“天亮运动”，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工委书记徐明哲于1944年9月上旬由城工部接受任务回上海后，立即召开工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华中局城工部关于贯彻中央指示的部署，着重组建工人地下军工作。决定在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等地区组织工人地下军。由张祺联系沪西、浦东；陈公祺联系沪东、吴淞；王中一联系沪南、造船厂、市政等工厂企业。吴淞地下军通过打入军火仓库和铁路工作的地下党员，搞到了手枪、手榴弹。申新九厂女工徐明哲，1941年参加共产党，曾在吴淞当过三年童

养媳，1945年初，党组织调她到上海，吴淞工人地下军领导人陈良安排江湾镇警察局地下党员成宝祥和车行“老板”高成忠掩护她，成宝祥穿着警察制服，骑着自行车，徐明哲手怀手榴弹坐在自行车后架上，三个人向上海进发。她两次顺利完成任务后，又领了4个手榴弹，藏在住处的柴堆里，等待党组织安排再送上海。

徐明哲在日军制药厂做临时工，一天下午放学后，回到车行，得知高成忠被日本宪兵抓去，他急忙赶到住处，房东拎着一个包裹等在门口，见到徐明哲小声说：“高老板被日本人抓去了，你赶快跑！”徐明哲接过包裹进屋将手榴弹放进包裹里，匆匆向吴淞走去。她把4个手榴弹交给了党组织，党组织告诉她，江湾地下党负责人已被捕，要她立即转移。徐明哲这时想起上级领导同志曾对她说过：“遇到紧急情况，可到南翔惠民中学找陆象贤。”她就到南翔找我，我立即将她隐蔽起来。徐明哲从江湾前脚走，日本宪兵后脚就到，四处追捕。她的50多岁母亲和4岁的侄儿被捕坐牢，她的继父家的房子被日本兵烧毁。徐明哲在南翔避难，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4年冬，上海工委决定利用群众中流行的新年发贺年片的习惯，在全市范围内发动一场政治宣传攻势，推动迎接抗战胜利的群众运动，寄发贺年片的对象是工商业者、高级职员、地方绅士、帮派头子等有社会影响的人士和保甲长、联保长等，对江伪军、政、警、特机关的汉奸，则发出警告信。警告信的署名都是“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和“反攻同盟上海分会”。主要交给邮局地下党来执行。

贺年片警告信发到了收件人手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日本占领当局一向认为自己的邮件检查是很严密的，现在大批贺年片、警告信竟然通过了检查，不禁大为震惊。于是，日伪宪警特务大批紧急出动，搜索和追查作案者。邮局有地下党员11人和群众10人被捕。并牵连到我。我闻讯回到南翔老家。日本宪兵队到了我的上海

寓所和邮局都扑空，又偕同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官来到南翔，让南翔警察局派一名警察去惠民中学说：“局长请陆校长去一趟”。我正在学校里，就示意教员地下党员胡训谩去警察局回话。我随即转移到北市稍合记花行，又转移到一家亲戚的家里。晚上我的母亲来领我到杨王庙，庙里的道士就安排我住在同大殿连在一起的杨老爷寝殿的楼上。我就在大殿隐蔽了三天。我的母亲又把我转移到嘉定西门外农村，以后我与上海邮局地下党取得了联系。这段不寻常遭遇，每逢春节常萦脑际，对南翔的乡亲好友和杨王庙道士一家肝胆相照的深情，是难以忘怀的。

汤世英是沪东棉纺一厂的工人群众领袖。抗日战争胜利后，她为了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拉起工人队伍，到国民党社会局与局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46年3月，她组织沪东棉纺女工群众会参加三八妇女节集会。游行。当时，国民党正在筹备召开“国民大会”。沪东女工群众提出“女工也要参加竞选代表”的口号。当天晚上，沪东女工在大康纱厂举行大会，自选“国民代表”候选人。汤世英当选为“国民代表”之一。1946年6月23日，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汤世英带领沪东女工队伍，到北站欢送“上海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因此，国民党特务将汤世英列入黑名单。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现汤世英处境危险，通知她立即撤退。她化名陈志毅，到南翔，由胡训谩安排汤世英与她的女儿同住，以他主管的腾村小学的代课教师为掩护。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地下党组织通知她：“上海解放即回原厂”。

新中国成立后，汤世英奉调到北京的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工作，现已离休。她常与我通电话，谈起往事，她对南翔滕家村的乡亲父老，在她危难的时候，对她胜过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至今念念不忘。

名人与南翔

■ 方益松

五月槐花香

仿佛，一夜间，小区里那棵槐树，就赶趟似的，一朵朵、一串串，兀自开花了。奶白如珠，怒放如雪，隐现在一片青绿之中，含蓄而不张扬。微风过处，则如无数的粉蝶一样，栖在枝头，万头攒动，不安分地扑扇着小小的羽翅，在香气袭人中，竭力诱惑着过往行人的视觉与味觉。

这样的槐树，在城市中并不多见。只是稀疏的，疏疏朗朗的几棵，没有看头。这个季节，若到乡下，则不同了。乡下的槐树，或成排，或成片，家前屋后，田头阡陌，多着呢。争先恐后，于碧绿的白中铺展成一片幽香的海。在我家老屋后，就有几棵刺槐，据说是爷爷插队时栽下的，比我年龄还要大，算来有近四十年光景了。

乡下人种槐树，不是取材，也非观赏，而是为了填饱肚子。时候也并不久远，大约追溯到三十多年前吧，在那个年代，不用说大米白面，就是五谷杂粮，能填饱肚子，也满心都是欣慰、欢喜着呢。听父亲讲，苦的野菜、涩的榆树皮，都曾经摆上桌面。日子过得紧迫，饥饿写进了每一个人的记忆，好在有了老屋后的几棵刺槐，贫瘠的日子，才有了企盼，伙食也多少有了一些改善。

每年的四月前后，青黄不接。我们就开始满心盼望那诱人的槐花香了。父亲也有事没事，总要到屋后转上几遭。那是类似于田间的青香，怕人偷。终于，闻到槐花那浓郁甘甜的气息，父亲牵了我和弟弟的小手，提着竹篮，用缚了镰刀的长竹竿，一会儿功夫，地上就散落了一串串的槐花。我贪婪

地捡起一束，眯上眼，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吧唧吧唧，满嘴甘甜而又清香。

记忆中，槐花的吃法有三种：母亲洗净槐花，和上粗面，包上一笼极有嚼劲的窝窝头，或烙上几块松软的大饼，最奢侈的，当数抓上一把珍藏许久的大米，加上一些大粒的盐巴，放上一小块自家炼制的荤油，用火煎熬，炖上一锅槐花粥。脆嫩如玉的槐花，裹着黏稠的米糊，清甜而蕴含着淡淡的槐香。还不及吃，单是闻那要命的浓浓香味，我们小孩子就足以狼吞虎咽好几回口水了。

前些日子，乡下的姨妈带来一些槐花，母亲也用同样的方法，让我们重温了一次早已渐行渐远的记忆。槐花不变，却再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我九岁的儿子，更是表情夸张，眉头紧锁，呈极其痛苦状，几至难以下咽。餐桌上，不由谈起老屋后的那几棵槐树。母亲说，全指着那几棵槐树，你和弟弟才能活到如今啊。我的眼前，不由得又浮现出几棵槐树，苍劲挺拔，葱葱郁郁，枝叶间，一串串槐花如玉般倒挂，摇曳了一树芬芳。树下两个小人儿，仰头观望，眼神中全是期盼与等待。

我知道，母亲像我一样，总也忘不了槐花的清香。即使岁月流逝，那种浓浓的滋味，早已在唇齿间，嚼摸入味，香入骨髓。而今，提起槐花的话题，只是母亲对那一段艰难困苦日子的回味与追忆，更是今天与往昔生活的一种强烈的对比。



新荷 吴肇方 图

鹤鸣槎溪 HE MING CHA XI

■ 徐增悦

灯会漫忆

我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但有时也会按捺不住，去热闹。看古猗园灯会就是其中一次。

天色阴沉沉的，有丝丝湿润的春风拂过，树叶发出若有若无的沙沙声。刚进北门，映入眼帘的是曲折回廊上挂着的十二生肖的彩灯。往东去一点，廊柱间挂着许多灯谜，人也骤然多了起来。有的孩子骑在父母肩上，头上戴着闪着绿色荧光的牛角灯，仄着身子，歪着脑袋，正动脑筋呢！

前面稍远些，是一片梅花林。此时已过开花盛期，树下遍地落花，柔柔地和着泥土。树上还有一些顽强的、行将枯萎的花朵，似乎留恋枝头、留恋春风、留恋过去傲霜斗雪的日子，不甘心就此香消玉殒。走在树下，依然余香可闻。这片梅林平时赏玩的人很多，有数不清的定格。不像辛词“驿外断桥边”的那枝“寂寞开无主”的梅花，但“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的品性，却是一致的。

公园里最热闹的地方，无疑是九曲桥周围了。缺角亭前，长长的一溜灯笼，背后是高大的，

黑黑的树丛，远望如秦淮人家；湖水是碧阴阴的，凝滞的，桥上檐边悬挂的小红灯，倒映在水中，微漾的波纹使湖水有了动感，看上去，既清冷、又神秘；桥南的石马上，孩子们爬上爬下，“驾驾”有声，热闹非凡。石马西边的树丛中，形神俱备地装饰着几只发着彩光的鸽子，有的在草丛中觅食，有的在枝头上小憩。旁边的彩龙，更是耀人眼目；但见其昂头曲腰、瞪目竖须，龙行虎步，似乎翼然欲飞。莫非象征着中华民族，龙的子孙，正在齐心协力、克服时艰，加速经济腾飞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湖的东边，有一座小桥。彩灯只在桥的顶部亮了一圈，柱子上则没有，隐隐如悬在空中；灯光也是淡绿的，没有这边的耀眼，却别有韵味。不禁又想起辛弃疾的《青玉案》：“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也是大师们所颂扬的人生至高境界。这样游逛下来，差不多有一个时辰，踏着沉沉的夜色归去，心田里是一片星星点点的、灿烂的节日灯火……

及防，从牛背上摔下来，左手腕疼得不得了。第二天父亲就带我到南翔镇一个诊所看病。很有名气的骨科医生王兰生检查后拿起手术刀为我割了两刀，说是放掉一点毒血，然后为我手臂上了夹板，用纱布裹紧，说小问题，休息几天就会痊愈的。父亲到河里摸蟹给我吃，说是蟹的再生能力强，吃了

■ 张帆

关于牛的往事

蟹，伤好得快。果然没过多久我的伤就好了。

水牛喜水。天热了一定不能忘记“浸牛”——放牛到河里放凉。有一次我忽略了这一点，我放的那头牛把我带进了槎浦河里。那是生产队里的牛。我父亲专职“做稻水”——负责几十亩稻田的水管理，让牛车水，灌溉到水稻田里。那天母亲在锄棉花田里的杂草，父亲放牛。一放学我就接替父亲的话。那时接近暑假，很热。

那牛吃了一会儿草，竟然往槎浦河快速奔去，我拉也拉不住。我来不及跳下牛背，就被牛带进了河里。全身的衣服与背在身上的书本全湿透了。母亲知道后忙问我有没有跌伤。我说没事，母亲才放心。

后来那家养牛户搬到宝山了，我就利用暑假割牛草出卖以

解决下学期的书簿费。我记得我和二弟一起到桃浦的南大路上去卖过牛草，也到半图大队牧场卖过。我们兄弟俩从早到晚割草，人弄得疲惫。有一次在半图大队牧场卖了草，差点被他们赖掉。幸亏我姑母找到了有关负责人，替我们讨回了草钱。

考上大学，告别了有关的牛事。但谁能料到我在参加工作后还是与牛事搭上了界。上个世纪70年代初，父亲还在为生产队养牛。